

意大利文献中明清时期的海宁及其影响

陈韵融^a 邬银兰^{b1}

(宁波大学: a. 外国语学院; b. 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海宁与意大利的历史关系可以追溯到元代。13-14 世纪,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到过海宁的长安镇, 并向欧洲人介绍了海宁。16 世纪末到 17 世纪中期, 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卫匡国等将海宁绘制在地图上。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许多意大利文献介绍了海宁的养蚕技术和钱江潮水。明清时期是海宁形象在欧洲构建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意大利文献中有关海宁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对研究近代海宁形象、浙江形象在欧洲的构建及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意大利 海宁 马可·波罗 卫匡国 罗明坚 明朝 清朝

【中图分类号】: D829. 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079(2022)05-0045-07

海宁是浙江省的历史文化名城, 与欧洲的历史关系可以追溯到 13-14 世纪, 最早来到浙江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的游记介绍了海宁的长安镇。16 世纪末-17 世纪, 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和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等意大利耶稣会士来到中国, 并在浙江居住和活动, 他们通过绘制地图将海宁介绍到了欧洲。18-19 世纪, 浙江作为中国经济特别是桑蚕产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受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关注。在 19 世纪初的意大利农书《桑蚕辑要》中, 对海宁的养蚕育种技术进行了介绍。^[1]海宁的钱江潮水也引起了同时期意大利学者的重视, 如在《太阳系的潮汐及共生现象》(以下简称《潮汐》)^[2]以及《浙江志》^[3]等著作中都有相关记载。

明清时期是海宁形象在意大利构建的重要时期。但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少。本文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相关记载开始, 重点对明清时期意大利原始文献中有关海宁的记载作一些梳理, 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一、意大利文献中的海宁及其相关城市

1275 年,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沿陆上丝绸之路进入元朝统治下的中国, 1291 年从泉州启程, 经海上丝绸之路西返, 并于 1295 年回到意大利。1296 年, 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亚那之间的战争, 结果被热亚那人俘获。在狱中, 他向一位名叫鲁思梯切洛(Rustichello da Pisa, 1272-1300)的作家讲述自己在东方的所见所闻。鲁思梯切洛把马可·波罗的口述内容用意大利北部流行的法语——威尼斯混合语(Franco-Venetian)记载下来, 整理成书, 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马可·波罗游记》问世时, 欧洲还没有印刷术, 人们只能用手工进行抄写, 目前, 已知的抄本共有 141 种之多。^[4]

《马可·波罗游记》中说, 从苏州到杭州的途中, 路过一个叫 Cianga 的地方(也称为 Ciangan, Caiugan, Cainghin, Cinghan 或 Cangan)。^[5]马可·波罗还说, 从此城出发, 骑马三日可到杭州。^{[6]318}从 19 世纪开始, 学者们对于这个 Cianga 中文原名提出了多种说法。有人认为, Cianga 应当是“长安”的对音, 即今天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所辖的长安镇。宋元时代, 长安镇位于运

¹作者简介: 陈韵融(2001-), 女, 浙江海宁人, 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 邬银兰(1979-), 女, 浙江杭州人,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博士(罗马大学语言、语源与文学专业), 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拉丁文手稿。

河旁边，是个交通枢纽。但长安镇至杭州的距离大约是 50 公里，骑马当天即到，不需三天。因此，有人提出此地名应是“松江”的对音，也有人认为是“长兴”或“嘉兴”的对音。但所有这些观点都无法令人信服。1932 年，西班牙托莱多教会图书馆 (Chapter Library of Toledo) 发现了一部新的《马可·波罗游记》拉丁文抄本，学者们称其为 Z 本，因为这部抄本是 18 世纪由一位名叫才拉达 (Zelada) 的主教捐献的。这部抄本明确写道：从“Cianga 到杭州骑马行走一天”，因此，Cianga 无疑就是“长安”的对音。^[7]马可·波罗说从长安骑马一日可到杭州，符合当时的实际距离。^[5]

马可·波罗介绍说：长安镇“甚大而富庶，居民是偶像教徒，臣属大汗，使用纸币，恃工商为活，织罗甚多，而种类不少”。^[5]³¹⁷ 此处所说的“偶像教”指的是佛教，“大汗”是指元朝皇帝忽必烈。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长安镇非常富庶，工商业繁荣，丝绸纺织 (织罗) 尤其发达，居民大多信仰佛教。

15-16 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全球化的兴起，浙江与欧洲的联系日益密切。特别是自 16 世纪末起，意大利人罗明坚、卫匡国等耶稣会士开始在浙江的绍兴、杭州、嘉兴等地活动。他们采取“文化适应”政策，积极与浙江的文人和士大夫交往，同时也通过绘制地图，向欧洲人介绍浙江。海宁开始出现在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中。

意大利人罗明坚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因“他在中学西传上的开拓性贡献”，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8]他于 1579 年 11 月到达澳门，1583 年 10 月，与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 一起进入中国内地传教。^[9]1588 年 11 月，在结束了中国 9 年的传教生涯后，他从澳门启程返回欧洲，随身携带了许多中国地图资料。1987 年，罗明坚绘制的中国地图在罗马的意大利国家档案馆 (Archivio dello stato, Roma) 被发现，由意大利学者罗萨多 (Eugenio Lo Sardo) 整理成册出版。该地图集收录了 32 幅地图，包括中国全图及两京十三省的分省地图及相应的手稿。地图和手稿的文字以拉丁文为主，也夹杂着一些中文地图和意大利文手稿。这本地图集本来没有题名，1993 年以《罗明坚中国地图集》(Atlante della China di Michele Ruggieri) 为题出版了意大利文版，金国平则将此地图集译为《大明国图志——罗明坚中国地图集》(以下简称《大明国图志》)。^[10]³ 在《大明国图志》中，收录了两张“浙江图”(CECHIAN)，编号为 T25 和 T28。其中的 T28 地图上，绘有“海宁所”。(参见图 1)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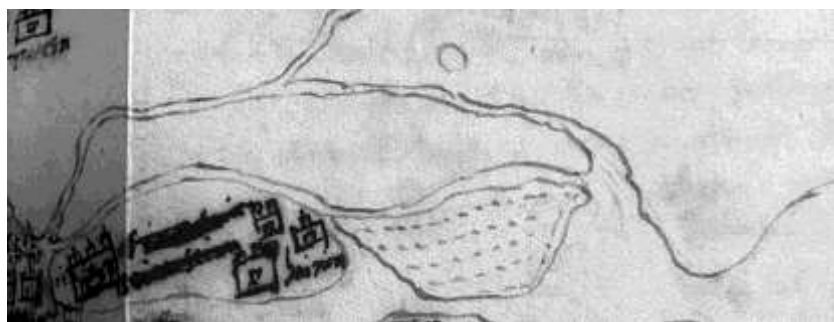


图 1 罗明坚《大明国图志》T28 地图中绘制的海宁所²

《大明国图志》是第一本由欧洲人绘制的中国地图，地图上除府州县外，还标注了明代两京十三省的卫所。根据目前的研究，罗明坚是最早在地图上绘制明代卫所的欧洲人，他的浙江地图非常形象地展示了 16-17 世纪欧洲人对浙江地方军事机构卫所的认知情况。其中 T28 “浙江图”上绘制的“海宁所”(拉丁文为“Hai nin”), 是“海宁”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

T28 地图的背面写有拉丁文手稿，罗明坚在有关杭州府记载中写道：“卫：杭州前卫、杭州右卫。所：海宁所在县治东”(“Guei: Han ceu ante. Hanceu a destris. Sù: Hai nin in sua hhien ad orientem”)。根据现有的研究，明万历十四年宝善堂刻本《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以下简称《大明官制》)是罗明坚中国地图和手稿的主要资料来源。^[11]《大明官制》中的杭州府条目下记载：“杭州前卫，经历司，镇抚司，左右中前后卫。杭州右卫俱在都司前，经历司，镇抚司，左右中前后卫。海宁守御千户

所在县治东”。^[12]虽然罗明坚的记载较《大明官制》更为简洁，但主要的信息是吻合的。查诸其他明代重要文献，如《大明一统志》，也有相关记载：“公署，两浙都转运盐使司，在府治北，本朝洪武九年即元旧制重建。杭州前卫，杭州右卫，俱在都司前，洪武八年建。海宁守御千户所，在海宁县东，洪武二十年建。”^{[13]12}可见，罗明坚关于海宁所的记载是正确的。这里要指出的是，《大明国图志》中文译者，将 T27 手稿中“海宁所”误译成了“海宁卫”。^{[10]97}我们知道，在明代的行政建制中，“海宁卫”并不隶属杭州府。《大明一统志》卷三九第七页关于嘉兴府的记载中写道：“公署，海宁卫在海盐县治西，本朝洪武十七年建。”^{[13]7}万历《嘉兴府志》卷二《城池》中也记载，“旧本砖城，岁久摧圯。洪武十七年(1384)，太祖高皇帝面谕信国公汤和视城要害，筑城增兵，以备倭寇。和遂开海宁卫，仍行浙江都指挥史司，委宁波卫指挥许能率军增筑四门，月城皆以砖石为之”。^[14]从文献可见，明代海宁卫隶属嘉兴府的海盐县。因此，罗明坚的原始记载是正确的，《大明国图志》T27 手稿中有关“海宁所”的错误是翻译者的误译。

1655 年，意大利耶稣会士、著名的地理学家卫匡国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中国新地图集》，书中收录了 1 幅中国总图、15 幅分省图以及 1 幅日本—朝鲜地图，其中一张就是“浙江图”(Chekiang)。^[15]在“浙江图”中，卫匡国标出了“Haining”(“海宁”)，并在旁边绘制了一个小城堡，按照《中国新地图集》的图例，这个小城堡代表的是“civitas minor”(“小城市”)，即“县”的意思(参见图 2)。



图 2 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中浙江省地图上的海宁县³

浙江省的第一府是“杭州府”，地图集中写道：“这个城市古代隶属于吴(U)王，后相继归属越(Jue)王和楚(Gu)王。秦朝时称钱塘(Cient'ang)，隋朝时首次得名杭州(Hangcheu)，唐朝时称余杭(Juhang)，宋朝时称临安(Lingan)，大明朝(Taming)后重被称为杭州(Hangcheu)。杭州府下辖 8 县：1. 杭州(Hangcheu)，2. 海宁(Haining)，3. 富阳(Fuyang)，4. 余杭(Juhang)，5. 临安(Lihgan)，6. 於潜(Yucien)，7. 新城(Sincheng)，8. 昌化(Changhoa)。”^{[16]646}海宁在三国时(吴)“置海昌都尉，后分海盐置盐官县，属吴郡”，元代“元贞初升高为盐官州，天历中更名海宁县，属杭州路”，明代“洪武中改州为县属杭州府”，清代海宁县“属杭州府”^[17]。卫匡国在地图手稿中列出的是海宁县，并且卫匡国绘制的中国地图与罗明坚的有很大的不同，卫匡国的中国各省地图中并不绘制卫所，所以，他在地图上标注的“Haining”指的应该是“海宁县”。在地图集的文字介绍中，卫匡国还介绍了著名的钱江潮水，“每年农历八月十八(相当于我们的十月)，壮观而汹涌的大潮，把江水推向城里，也带给了哲学家们无尽的讨论话题。实际上，钱塘江的潮水全年都很高，农历八月十八这一天的潮水是最强、最猛烈的。这一天，掀天的巨浪，伴着隆隆的巨响，以排山倒海之势倒灌江中，其力量足以将江中所有的舟船掀翻。钱塘江大潮非常有名，每年农历八月十八日下午四点左右，杭州府的百姓，包括官员，还有那些外地人和外国人都要赶到江边来观看这壮观的潮水”。^{[16]649-650}虽然目前还没有资料表明卫匡国亲自见过海宁的钱江潮，但他在地图上绘制了“海宁县”，也是目前所知的欧洲最早绘制“海宁县”的地图之一。《中国新地图集》的版本很多，流传也非常广泛，除了拉丁文版以外，还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如德文、荷兰文、法文、西班牙文等版本在欧洲各国发行，为欧洲人了解海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

二、海宁养蚕技术被写入《桑蚕辑要》并对意大利和法国产生影响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拉近了海宁与欧洲的距离。特别是 19 世纪中期以后，海宁与欧洲的交流进一步加强，一些意大利文农书中介绍了海宁的养蚕技术。

中国是蚕桑丝织业的摇篮，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养蚕缫丝，公元前 6 世纪左右中国丝绸传入欧洲。^[18]但直到近代，欧洲的蚕桑丝织业都一直落后于中国。17-18 世纪，法国在华耶稣会士将中国的几本重要的与蚕业有关的农书，如王祯的《农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及《钦定授时通考》传入法国。《农政全书》中有关栽桑养蚕技术的内容也被翻译成法文出版，^[19]引起了法国、意大利学者的浓厚兴趣。

意大利是近代欧洲蚕桑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其北部地区，如皮埃蒙特(Piemonte)、伦巴第(Lombardia)和威内托(Veneto)地区。早在 19 世纪初，意大利就有好几部有关桑树种植和蚕业的农书出版，如丹图鲁的《养蚕新技术史》，^[20]维利的《桑树和葡萄树种植实用农书》^[21]。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拥有爵士头衔的意大利贵族，其中丹图鲁的书在 19 世纪末被傅兰雅口译、汪振声笔述译成中文出版，书名为《意大利蚕书》。^[22]丹图鲁在书中讲到了中国桑树的嫁接技术、蚕室的设置、温度控制以及喂养方式等。这些书籍的出版和翻译，充分体现了意大利与中国在蚕桑技术上的相互传播和交流。在此背景下，海宁自然出现在了意大利蚕业技术书籍《桑蚕辑要》中。^[1]

当时的欧洲，对蚕病的防治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死亡率仍然很高。如法国学者波斐(Camille Beauvais)在 1837 年法文版《蚕桑辑要》序中讲道：“中国的养蚕技术优于欧洲，因为他们养的蚕死亡率是 1 %左右，而我们的则在 50 %以上。”^[23]^{X11}也正因此，欧洲学者急需从中国学习一些有用的防治蚕疫的技术。

早在 1835 年，波斐就依据当时已经翻译成法文的一些中国蚕书进行了育蚕实验，获得了非常满意的结果，并建议法国的农工商部长将当时收藏在法国的中国蚕书翻译成法文。1837 年，法国东方学家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 1797-1873)将《授时通考》卷七十一至七十六中的蚕桑篇、《天工开物·乃服》中的蚕桑部分译成了法文在巴黎出版，书名为《蚕桑辑要》。^[23]在此基础上，植物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博纳富(Matthieu Bonafous, 1793-1852)于同年翻译出版了意大利文版的《桑蚕辑要》，并将原书的附图一并出版。这本书为意大利蚕业界提供了一整套关于中国养蚕、防治蚕病的完整经验，这对当时意大利的养蚕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1]博纳富是法国人，但他的家族很早就移居到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地区从事运输业，博纳富本人也长期住在意大利的都灵并担任意大利都灵皇家农业院院长。博纳富的兴趣非常广泛，蚕业一直是他研究和关注的领域，并与专门从事养蚕研究的法国学者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经常就养蚕问题进行书信交流。

意大利文版《桑蚕辑要》主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栽桑技术，第二部分介绍养蚕技术。在第二部分的“蚕种浴种”这一章节，介绍了海宁养蚕技术中特有的育种技术，即“催青”和“冬季浴种”：“海宁县在清明节(4 月 5 日)的前一天晚上，养蚕人将蚕卵裹在棉衣里，睡觉时压在身体下面，因为他们认为人的自然体温可以加快蚕卵的孵化。农历十二月十二日(也就是说 12 月末，闰月的话就在次年 1 月)，所有养蚕的人家都把蚕卵泡在盐水里，然后用茄子烟熏，再将蚕卵藏在一堆大米里面。24 天以后，将蚕卵取出，用活水冲洗，等待春天的到来。”^[1]¹⁰¹⁻¹⁰³这段介绍应该来自清代文献《授时通考》的记载：“【海宁县志】清明夜，育蚕之家各裹蚕子于棉衣中。卧身下，谓蚕得人气始生。【又】腊月十二日，养蚕之家各以盐卤茄灰熏揉蚕子，藏之谷壳中，廿四日则出之浴于川，以待春至。”^[23]从博纳富对“催青”技术的介绍可以看到，他的理解基本是正确的，即通过人的体温来控制蚕卵孵化的温度，加快催化蚕种的孵化。不过，在介绍“冬季浴种”时却有误解，如对“盐卤茄灰熏揉蚕子”的理解。博纳富认为是先用盐水浸泡，然后用茄子(petronciana)烟熏。实际上，“茄灰”的“茄”不仅仅指“茄子”或“茄秆”的灰，而是茄秆、谷草、桑柴一起烧成的灰。另外两处误解是：把将蚕子“藏在谷壳”中理解成了“藏在一把大米”(un mazzo di riso)中；将腊月二十四日(“廿四日”)理解成了腊月十二以后，再过二十四天。这些误解，也非常形象地展现了中国与欧洲技术交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

中国古代，民间积累了许多实际劳动生产的经验，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在 19 世纪中期以前，一些在实际劳动过程中积累的农业生产技术，主要依靠经验传授。如《授时通考》中记载了海宁人在浴种时使用“茄灰”，但“茄灰”的组成如何、比

例如何，并没有做具体分析。这种在东西方异质文明和技术交流中出现的误解问题，也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和技术西传史时应该重视的方面。此外，此类误解对 19 世纪初的欧洲蚕业到底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也有待于更多的学者、特别是科学技术史方面的学者来关注和进一步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博纳富在书中增加了大量亲自在意大利进行蚕桑实验的内容，还将这些实践经验与中文文献介绍的技术进行对照说明；并且对一些专有名词进行了拉丁文注释，如博纳富在解释“茄灰”时，为意大利语词汇“petronciana”（“茄子”）这个词注上了两种拉丁文学名（1. *Solanum melongena* L. 2. *S. esculentum* Dun），充分体现了欧洲学者的严谨性。因此，这部著作对于研究中国，特别是浙江蚕桑技术的西传以及对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所产生影响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三、海宁因钱江潮及其观赏佳地而闻名欧洲

浙江的钱江潮水闻名天下，17 世纪中期，意大利人卫匡国就非常具体地描写了钱江潮水以及杭州府老百姓观潮的风俗。19 世纪末期，随着中国的开埠，欧洲人对中国有了更为直接的了解。1899 年出版的意大利文《浙江志》中记载了海宁的钱江潮。虽然这本《浙江志》的成书背景可能与当时意大利觊觎三门湾事件有关，因为作者卡里（Mario Carli）同年还在《意大利地理学会报》发表了一篇有关三门的论文，^[26]但是从内容来看，这本书从地理和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较为客观地介绍了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情况，为我们研究浙江经济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书中在介绍钱塘江潮水时，还专门介绍了海宁：“潮水非常壮观，特别是季风变化时，东北风将太平洋上大量的水带向中国海岸，潮水非常大。杭州湾的形状像一个漏斗，海水越向前海面逐渐缩小，一直到与钱塘江的江水相撞。这种撞击激起了高达 5 米的浪头，新的水流加大了潮水的力量，将潮水推向狭窄的江岸，潮水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 25 公里，从陆地上可以听到像雷声一样的巨响。从杭州的高地，特别是在海宁观潮，可以看到最美的潮水，美得令人窒息。”^{[3] 102-103}可见，至少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洲人已经知道钱江潮的奇特和壮观，并且知道海宁是中国最佳的观潮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洲科学界非常重视对潮汐现象的研究。^{[2] VII-IX}1905 年在意大利都灵出版了著名的地球物理学专著《潮汐》，这部书介绍了当时国际学术界有关潮汐学研究最前沿的学术成果。全书正文为 20 章，主要是英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查尔斯·达尔文（G. H. Darwin, 1845-1912）的潮汐学研究成果，这一部分由意大利学者马格里尼（G. P. Magrini）译成意大利文，附录中的 7 章是马格里尼本人在意大利进行的潮汐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乔治·达尔文是“进化论”的提出者，英国博物学家、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 R. Darwin, 1809-1882）的儿子。在第 3 章“江河潮汐现象——潮汐力磨坊”中，他依据英国人默勒（Moore）于 1888 年和 1892 年，两次率英国舰队对钱塘江潮水进行监测所得的数据，以中国的“钱江潮”为例，对地球上的江河潮汐现象进行了科学分析。^{[2] 48-61}

此外，书中还介绍了海宁“钱江潮”起因的民间传说：“好几个世纪以前，有一位为皇帝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他受到老百姓的爱戴。但却引起了皇帝对他的妒忌。后来，皇帝下令将他处死，投入钱塘江中。将军的灵魂想要报仇，便将大海的潮水引入淹没了海宁，海宁当时是最宏伟美丽的都城。”我们知道，历史上海宁从未成为中国的都城，这里欧洲人应该是将海宁与它所隶属的杭州府混淆了。1138 年，南宋定都杭州后，将杭州称为“行在所”或“行在”，^[26]意为皇帝临时暂住的地方，以表示收复北方故土的决心。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杭州则被称为 Quinsai（又作 Quinsay, Kinsay 等），这是汉语“行在”的音译。欧洲人从《马可·波罗游记》知道，“行在”是“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是当时统治中国的蒙古“大汗”所在地。^{[5] 317-322}《潮汐》一书中在讲到海宁潮水的时候，还特意分析了为什么马可·波罗在杭州居住了 1 年多，竟然在他的游记中没有提到钱江潮。乔治·达尔文的解释是，钱江潮是“阶段性的”，即从较长的历史时期来考察，历史上某一特定的时段，钱塘江潮汐现象并不明显。^{[2] 56-57}这里反映了晚清时期的欧洲人将海宁看作是杭州城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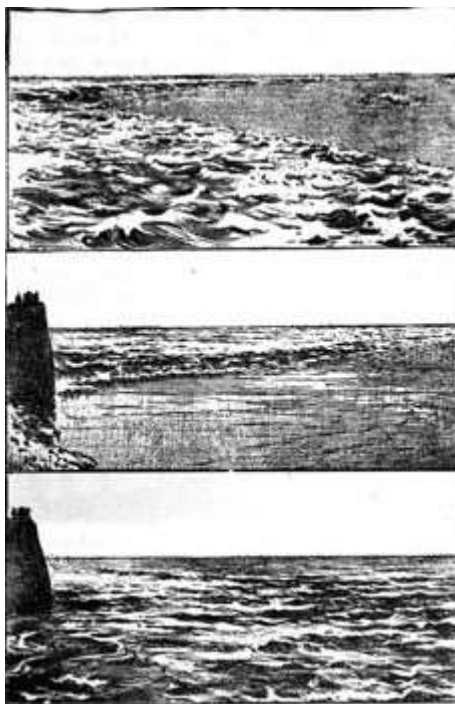


图3 海宁钱塘潮照片

书中还介绍了每年在海宁举行的“潮神祭祀”风俗：“海宁的老百姓对潮水一直向对神灵一样敬畏，有一天，据默勒船长统计，有5、6千人在钱塘江边祭祀潮神，他们将很多祭品投入江中。”^{[2]57} 这些文献记载，为研究晚清海宁的潮文化及其西传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西文史料。特别珍贵的是，书中翻印了一些欧洲人在海宁观潮的照片，其中3张是英国人默勒于1892年10月9日和10日在海宁拍摄的（参见图3）。第1张是1892年10月10日在海宁一处高于江面9米的观潮点拍摄的，当时的潮水高度是4米；第2张和第3张于1892年10月9日在同一地点拍摄，其中第2张的拍摄时间是下午1点29分，第3张是1分钟以后。^{[2]55-56} 这些照片，真实、形象地向当时的意大利读者展示了海宁潮水的独特风貌。

从《马可·波罗游记》对海宁长安镇的介绍到《潮汐》对海宁钱江潮水的研究，我们可以大致看到，几个世纪以来，海宁形象在意大利构建的基本轨迹。其中，明清时期是海宁与意大利关系史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海宁形象在意大利的构建历史，也是浙江与欧洲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进一步整理和发掘这一时期海宁与意大利交往的原始史料，有助于更加清晰地呈现海宁走向世界的历程，以及全面钩沉浙江与欧洲交往的历史，也能为当前海宁甚至浙江国际化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提供重要的历史依据。

参考文献:

- [1]JULIEN S.Dell'Arte di Coltivare i Gelsi e di Governare Ibachi da Seta Secondo il Metodo Chinese[M].BONAFIOUS M.Torino:Coi Tipi di Giuseppe Pomba E C.,1837.
- [2]DARWIN G H.La Marea ed i Fenomeni Concomitanti nel Sistema Solare [M].MAGRINI G P,trad.,Torino:Unione Tipografico Editrice,1905.
- [3]CARLI M.Il Ce-Kiang:Studio Geografico-Economico con una Introduzione Storica e una Carta[M].Roma:Forzani E.C.Tipografi del Senato,1899.

-
- [4]马晓林.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本与礼俗[M].上海:中西书局,2018:4.
- [5]龚缨晏.马可·波罗对杭州的记述[J].杭州大学学报,1998(1):34-40.
- [6]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M].沙昂海,注.冯承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7]MOULE A C,PELLIOT P.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M].Vol.1.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1938:326.
- [8]张西平.罗明坚《圣教天主实录》拉丁文版初探[J].宗教学研究,2015(4):197-202.
- [9]谢明光.从新发现文献再探罗明坚及其在华传教[J].国际汉学,2020(4):70-85.
- [10]罗明坚.大明国图志——罗明坚中国地图集[M].罗·萨多,整理.金国平,译.澳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2013.
- [11]龚缨晏.罗明坚《中国地图集》中的“辽东边图”与象山县地图[C]//姚京明,郝雨凡.罗明坚《中国地图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2014:114-134.
- [12]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五卷).陶承庆,校正,叶时用,增补[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二六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撰委员会编.山东:齐鲁书社,1996:82.
- [13]李贤,彭时,吕原,等.大明一统志:第38卷[M].内务府本.1461.
- [14]万历嘉兴府志:第2卷[M].刘应铎,修.沈尧中,撰.嘉兴地方志办公室,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2.
- [15]MARTINI M.Novus Atlas Sinensis [M].Amsterdam:J.Blaeu,1655.<https://www.cartahistorica.com/our-catalogue/asia/china/complete-series-of-china-maps-by-martini-and-blaeu/>.
- [16]MARTINI M.Novus Atlas Sinensis,Vol. III,T. II[M].BERTOLUCCI G,ed..Trento: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Trento,2002.
- [17]雍正浙江通志:一[M].沈翼机,撰,李卫,嵇曾筠,修.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282.
- [18]龚缨晏.西方早期丝绸的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76-84.
- [19]毛传慧.从晚清蚕书看西方对中国蚕桑技术的影响[C]//傅汉思,莫克利,高宣.中国科技典籍研究:第三届中国科技典籍国际会议论文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255-264.
- [20]DANDOLO V.Storia dei Bachi da Seta Governati coi nuovi Metodi [M].Milano:Salla Stamperia Sonzogno e Compioni,1817.
- [21]VERRI C.Saggi di Agricoltura Pratica Sulla Coltivazione dei gelsi e Delle Viti [M].Milano:Per Giovanni Silvestri,1818.

[22]丹图鲁. 意大利蚕书 [M]. 傅兰雅, 口译. 汪振声, 笔述. 上海, 江南制造局, 1898.

[23]JULIEN S. RéSumé des Principaux Traités Chinois sur la Culture des Mûries et L' éducation des vers à Soie [M].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37:XII.

[24]鄂尔泰. 钦定授时通考: 第 72 卷 [M]. 武英殿刊本. 1742:12.

[25]CARLI M. La baia di San-men(con una cartina)[J]. Bollettino della 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a, 1899, 36: 156-163.

[26]周淙. 乾道临安志: 卷一 [M]//宋元方志丛刊: 第四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3241.

注释:

1 T28 地图背面是手稿 T27, 列出了浙江的府县卫所, 其中杭州府下列出了 8 个县, 即钱塘县、仁和县、富阳县、余杭县、临安县、於潜县、新城县和昌化县; 2 个卫, 即杭州前卫和杭州右卫; 以及 1 个所, 即“海宁所”(参见《大明国图志》第 127 页)。手稿中没有列出海宁县。所以, 地图上绘制应该是海宁所而不是海宁县。

2 图中标注的“Hai nin”即“海宁所”。

3 图中标注的“Haining”即海宁县, 参见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中“第十省浙江”地图。

4 卫匡国用“杭州县”来统称当时的“钱塘县”和“仁和县”。